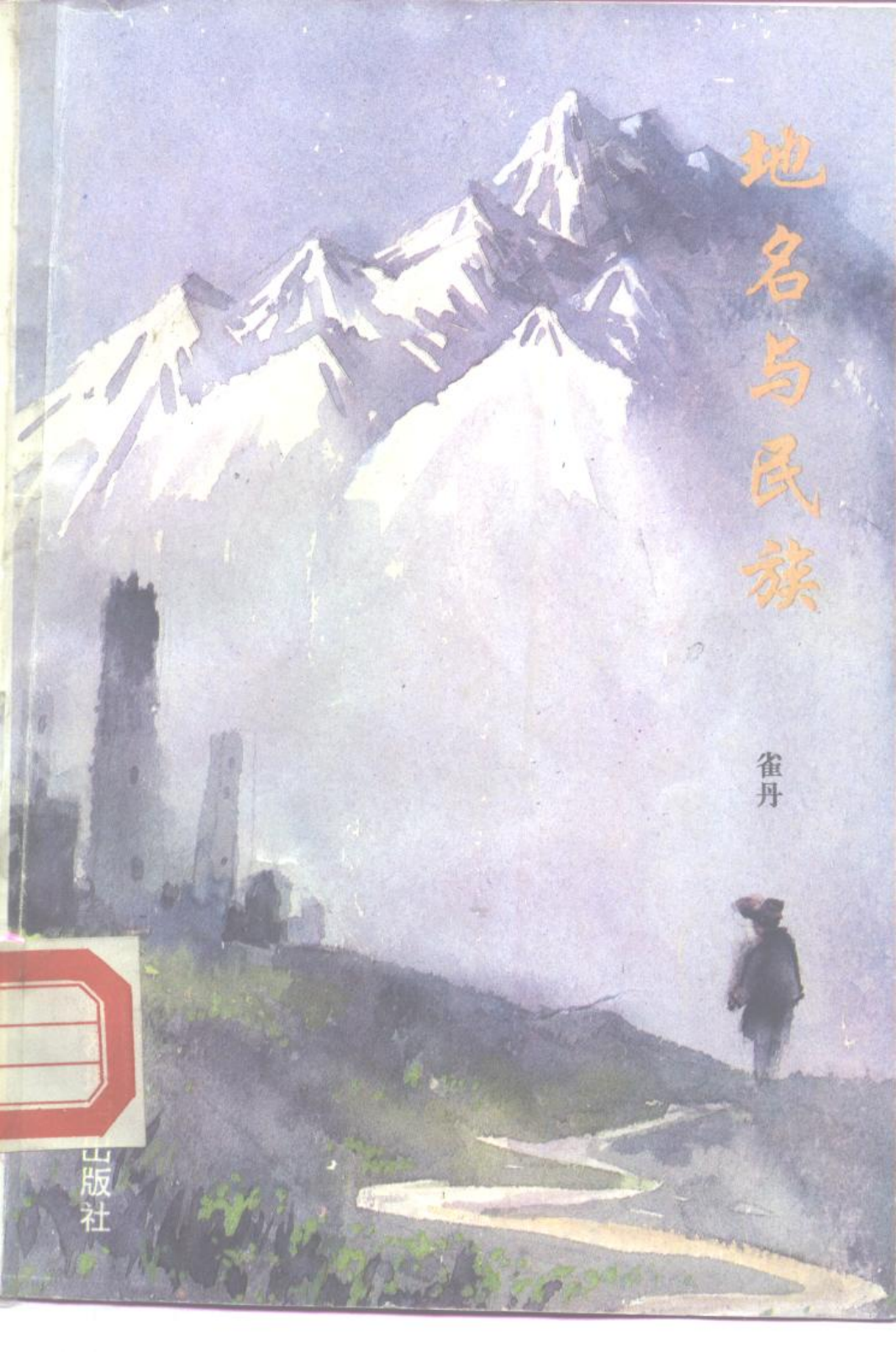




地名与民族

雀丹

出版社

地名与民族

成都地图出版社

(川) 新登字013号

地名与民族

雀 丹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印数：1000 定价：4.00

书号：ISBN7—80544—243—6/K.233

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前 言

(自 序)

在人类社会发史中，产生了不少的民族和宗教，成为形成国家的一种要素和文化。地名，就是随之而产生的，并且紧紧地依赖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区和民族语言、文字来命称和书写记录传承下来并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地名属于既可悟又可视的文化景观。文化地理力图通过地名的研究，再现各地的自然景观，历史景观，指示历史上重大政治变革，经济兴衰，民族迁徙，宗教信仰等状况。所以，由地名可以（特别是古地名和语种混合的历史地名）透视给我们无限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作证于千古历史苍桑为证人。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是文化现象。它和建置沿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历代建置多以地名而设，古往今来，还找不出不以地名冠戴设称建置的政区称谓名。

在灿若星汉的神州地名中，无一地名不有它自身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们都是带着自身所打印上时代与地域的特点和民族、宗教诸种特色烙印，作为历史苍桑的见证人而出现、记录和再现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尤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名，更是以它独特的属性和本源，作证于千古民族地区的历史见证。

地名是如此，民族，也是如此，它自人类文明的帷幕启开之始，这个集自然特征的地域、经济、语言为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种共同意识为一体的人类不同的共同体，就以其

“群体意识”展开了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斗争，从而推进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和进步。

尽管“民族学”是一门发展比较晚近的学科，也是一门争议较多，挫折不少的学科。但是“民族”的形成是古老悠久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下，民族是有其不同的含义和属性解释的。

我国不仅是世界文明的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国家尚未诞生的时刻，就在孕育中华民族的沃土上，主要分布着三大人群集团：在黄河中游是华夏集团，有黄帝、炎帝、尧、舜、禹等著名首领；处于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的是东夷集团，有太昊、少昊蚩尤等著名首领；位于长江以南和江淮流域地区的是苗蛮集团，有猎头等著名首领。除此，在黄河上游地区还聚居着诸羌集团，在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则有百越集团，其它边远偏僻地区还有不少土著部落等等。

经过历史上的民族征战和融合，特别是黄帝击败炎帝的融合，继而又击败了蚩尤，到尧舜之时，再经华夏部落集团逐又融合了东夷部落集团，渐而又把部分苗蛮部落集团给融合了进来，经过大禹治水，征服自然与部落战争，终于融合为华夏族，并且已经拥有九州，包括今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广袤的土地。夏王朝的建立，是华夏族的诞生的重要标志。在华夏民族周围，还有诸多的土著民族和部落，由于长期在经济生活的相互依存和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依裙带关系中，历史地形成了多元统一的国家。在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基础上，由于有各民族迁徙、聚合、战争、贸易等不同形式的交流往来，彼此融合，文化方面（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文

明的和野蛮的手法)互为吸收而形成的光辉灿烂,古老悠久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华民族祖先所经历的客观和历史事实的存在,是千百年来的客观史实,就连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也是由不同部族和民族文化融合交流,逐渐演变而成的。除此,更能作证千古的是——地名。她象时代的传真录像带、摄像机,象活的化石一般,为我们透视和映证着千古历史民族的史影和存在。例如现今的我国五十多个民族的“族名”,就有不少是以“地名”,或物产、宗教、历史事件、生活习俗、耕耘方式等等相关而产生出的以地名相冠戴,或带有地名含义而命名称谓的。

地名、民族和族名,是历史形成的,又是互为关连难于分开的。大凡研究地名的人,或学科,都离不开民族和族名的研究;反之,研究民族的又离不开对地名的研究。它们象一对孪生姐妹,二者无法分割开来。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都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它数千年以来,一直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强国的心理纽带。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历史文化真正的内核,是客观历史。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现实总有历史的影响,谁要割断历史,就会受到现实的惩罚。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同样史实和历史事件都是映入这眼睛中客观存在的景物。历史之所以为科学,一是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二是以事实为基础来说话,若是歪曲事实,就没有历史和科学之可言了。历史唯心主义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歪曲现实才去歪曲历史,这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敌人,他们为进行资产阶

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搞渗透的需要。他们忘了现实总是受历史支配的，而历史又都是受现实支配的人写的。不过，史实的存在是客观的，尤其是地名和民族的存在，谁要去歪曲，只能是一时将迷人的面纱掩盖，终究不能长久的。当前举国上下编修地方志的盛举，是继承宏扬传统文化之一，它是由地入史，以史经世。史与志总是少不了地名和民族，若少了二者，就不可成史和志。我国著名的二十四史就有十六部是地名志。

本书以地名与民族同史志、宗教等相关联范畴进行探索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史，乃至是中华文化，可见古今史志，乃至各学科都离不开与地名的关系，尤其是少数民族优秀灿烂文化，更与地名分不开，本书就其地名与这些学科的内外在关系作一探测。书中所集选编入的文章，均系作者十年来在国家、省、地区报刊杂志上已发表过的，而且对于与他人合著的文章一律拒选。当然，这些文著，无论从史实和论述上都有必要根据作者不断掌握的丰厚资料和学识的提高和认识的发展，很有必要进行补充和加以改动余地。但作者掩卷神思，琢磨再三，认为对比是横向的，差距产生于纵向发展之中。限于作者当时认识水平和观点的逐渐成熟过程史，为保持作者历史发展和思想认识变化过程的原本，决定除政区变革和明显的错漏地名进行了纠正外，其它方面不作删改，力图让其历史保持它的原貌载世，求得有识之士不吝赐教和启迪。只要读者能从这些拙文中得以粗浅地认识道：每个地名或形于文字、或出自语言、或蜚声文学，或置身历史，或涉及外交，或名噪战争，或与民族相联，或与宗教相关，或利于考古，或益于旅游……，其内容极为丰富，名目斑斓夺

目，并跨涉多学科，内涵极其广阔。它在大千世界中以朴实的感情和存在，向人们透视着千古史影，而这些史影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和凝聚力之所在，为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发展起到“资政、存史、教育”的功能作用或参考，便是作者的最大欣慰和收获。

作者

一九九二年元旦

于成都

地名与民族

目 录

前 言

一、地名与民族

1. 地名是民族历史的见证…………… (1)
2. 论地名与民族和族称…………… (10)
3. 地名与羌民族历史和文化…………… (21)
4. 论地名与神话…………… (30)
5. 略谈地名和族名…………… (36)
6. 阿坝州县名浅释…………… (39)
7. 浅论“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 …… (51)
8. 地名标志设置综述…………… (58)
9. 论强化民族地区地名管理和研究的重要意义
…………… (66)
10. 阿坝地名今昔谈 …… (78)
11. 藏语地名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 (86)
12. 评羌文化特性和大禹故里考 …… (91)
13. 论民族地区地名考证方法及其意义 …… (96)

14. 藏区地名中反映《格萨尔》史诗踪迹 (109)

二、地名、民族与史志

15. 嘉绒藏族族源探索 (121)
16. 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 (139)
17. 大禹出生地——汶川小考 (165)
18. 藏族有没有姓 (167)
19. 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大工程 (171)
20. 论阿坝佛教的历史和特征 (181)
21. 藏区修志刻不容缓 (190)
22. 古东方大族——羌 (194)
23. 野史《金川妖姬志》对“一征金川之役”
 实质的揭示 (205)
24. 地名与史志 (214)
25. 介评《阿坝州志·民族志》 (219)
26. 《阿坝州志·建置沿革志》读感 (227)
27. 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纂民族地区
 志书问题 (232)
28. 少数民族地区修志工作杂谈 (245)
29. 论民族地区宗教入志问题 (252)
30. 略谈文化艺术志中的宗教艺术 (268)

三、编后记 (275)

地名是民族历史的见证

不同地区的古代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虽然有的分散了，有的聚合了，但一般都与现今存在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现有五十多个民族，都有其产生、发展和分散、聚合的演变过程。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交往中，对某一地理实体或区域所赋予的专用称号。因此，地名也是我们各民族人民在千万年生产劳动、社会生活需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和演变下来的。地名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变化中也历尽了沧桑，有的湮没了，有的变异了，有的发展了。地名的产生、发展、演变都有其一定的依据，都是和有关民族的活动历史紧紧相连而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地名是“史实的见证人”和“传真录像”，地名能以其特有的方式记载民族文化史。下文试以四川西北部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名为例，作一概要分析和论证。

历史上民族的分散与聚合

川西北地区地理状况极为复杂，既有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绝壁千仞的山岳地带，又有河流蜿蜒的绿原平川；其间有蜚声中外的九寨沟风景名胜地和熊猫故乡——卧龙大熊猫保护区。古代，在这些地方居住着藏、羌为主体的民族、部族众多。由于交通闭塞，长期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禁锢，掺杂融

入其他的民族较少。至新中国建立初期，其地（少数靠近汉族居住区的民族杂居区除外）仍严格保留着异族间禁婚和部落间禁婚的制度。但民族的分散与聚合，民族间的往来活动，以及迁徙与融合仍至可以从地名的演化史中显示其斑斑踪迹痕迹。

这个地区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地名（不包括解放以后命名和更名的地名），从语种方面来看，就有藏语（包括卫藏、安多、康巴方言）、汉语、蒙语，还有费孝通先生将其划列为“语言孤岛”的嘉绒语。嘉绒语中又分若干支派，一山一村，一寨一沟各操一独立的语言。异村异寨是听不懂的，当地称这种语言为“龙巴”或“寨话”，费先生称为“家庭语”。还有，对一地名的称呼，由几种民族语言掺杂混合组成，被当地称为“混合语”等很多种。由此可以分析历史上民族（包括部落、部族）的分散与聚合。若尔盖县的一处三百余万亩的大草坝叫热党坝，其中有个小寨子名叫“霍尔”。寨里三十余户人家，语言、风俗和宗教信仰都与藏族无异。藏史资料中有“霍尔”这一称呼的记载。据民间传说，地名沿袭了这一称呼。据调查认为，是原来的蒙族逐渐藏化了。其地有一座大雪山，名叫“阿尔干渣”是蒙语地名，含义为“柏树神山”，其山确实是柏树森林，大雪盖顶。对这些地名经过调查和追溯来历，与传说这里为格萨尔王（藏族）同霍尔白帐王（蒙族）分争作战的地方相吻合。这些地名，可以为格萨尔（史诗《格萨尔王》）是否确有其人提供研究的参考资料，也可以说明，古代蒙族在此有过生息繁衍的事实。川西北辽阔无垠的草原上，至今保留有不少诸如“将军营盘”、“风棚子”、“海子山”、“山脚坝”等纯汉语地名。而在汉语称呼的

藏语地名中，加入一个汉语通名，形成通名重叠现象的例子很多。例如，红原县的嘎曲河，藏语的“曲”已指河了。汉族来此后，为便于理解、识别，就在“曲”音后面再补加上一个通名“河”。再如“大朗足沟”，这里的“足”已是藏语方言（龙巴话）所称的通名“沟”了，却又给加了一个“沟”。更具特点的是，在黑水与松潘交界地区有一个地名叫“龙日足柯”，这是操不同少数民族方言语的混合，“龙”为藏语，指沟或谷，“日”指山或岗，联称一般理解为“山沟”（藏语多为倒装），这是通用藏语的安多方言的习惯称呼。而“足”是嘉绒藏语（龙巴话）所称呼的沟。再加上一个“柯”，即通用藏语（卫藏方言）所指的沟，这条地名若用汉字译写过来，可以变成“山沟沟沟”，若从语言结构分析，并结合社会调查，古代历史上民族分散、聚合的画面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宝塔形的金字塔地名集成堆，正好反映出宝塔形金字塔的民族文化堆层。民族间的历史活动中对地名的音译或误称，均保留了民族活动的痕迹。在汶川、小金两县相接处的全国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卧龙区内有“四姑娘山”。唐代吐蕃东进，统一了这个地区（古代这里为冉駹国地、汉唐为西山八国、附国羌地），接着，藏族原始宗教—钵教和后来的藏传佛教都先后传入其地。藏传佛教中也有较多的原始拜物教成分，把山川树石拜称为“神灵”。吐蕃统一这里后，将上述山峰命名为“斯古娜柔达”，古藏语意为“保驾神山”，是对“嘉绒藏区内最大神山—木尔多”而言的，意指是木尔多“大神”的“保驾神”，平素习惯称谓上称用“斯古娜”（“保驾”），很少用“柔达”（“神山”）。清王朝乾隆年间两度用兵金川，在这一地区先后打了十数年大仗。乾隆皇帝从政治统

治上的需要出发，把此战的胜利解释为“天助”和“神援”。战息之后，清王朝列表册封和祭祀金川地区山川“诸神”，用汉字书写“斯古娜柔达”，为“四姑那山”，民国年间又书写成“四姑娘山”。继而藏汉文史资料中就都有了不同字义的记录，并在民间和文艺刊物中都出现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神奇美妙的传说故事，牵强附会，浓墨渲染，从而已蜚声中外。斯古娜柔达和四姑娘山双名在同地而不同民族中各所称呼。诸如此种地名还有很多。由于民族间的各种活动，民族的聚合与分散，随之而来的语言互译等原因，形成了一地双名或多名、多称多义的现象。这类地名，在当地群众中必须分族籍、语种同时称呼，才能在几个民族中同时把这一条地名叫应。否则，在一个民族中叫应了，而在另一个民族中就叫不应。这样，对另一个民族或操另一种语言的人来说，就成了“哑”地名，上述“斯古娜柔达”或“四姑娘山”就是一例，你若称此山为四姑娘山，住在山脚下的藏族老人听不懂；只要你一称斯古娜柔达，他们就马上知你所指，也许还会滔滔不绝地向你介绍这山的神奇传说故事和地理面貌。

在一主体民族居住地区保留的古地名中，有他民族称呼的异名时，可以深追细究，以探索有关的民族问题。若将这一地区的大量地名进行审慎的分析，认真追溯考究，有助于研究这一地区民族的分散与聚合，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以及民族间的商贸、文化等等方面的交往的历史。

这里顺便指出，在意译藏语地名时，要求准确，否则，会给地名标准化造成混乱，红军长征路上有一地名叫“杂曲河”，现又通称“白河”，此名为错译。“杂曲”，喻指河水盘绕冲流形成状似藏文字母“杂”的形状：“呷”音意为“白颜

色”，解放初期译者对藏语不精准通熟，不能明辨语音差别导致误译。刘伯承元帅的长征回忆录里不是就写的“尕（嘎）曲”吗，当地藏民一听即懂，而且甚感亲切，说：“他老人家还记着我们啊！”由这一地名实例说明，地名的译转是一件科学性、民族性和历史性都很强的工作，千万不可小视和马虎。

地名是史实的“传真录像”

地名是时代的标志，地名能生动地记录史实，成为历史实录片。阿坝县，过去蒲孝荣教授曾考证这个县名是“因大渡河上游的阿坝河而得其名”（见《四川历代政区考证》），经实地调查和查阅藏汉文史，其实不然，“阿坝”，本为藏语“阿洼”的译音，“阿坝河”是他称名，藏史料中证实对阿坝河当地历来称为“玛曲柯河”（意指发源于青海、甘肃两省内的班玛县和玛曲县的河）并不称阿坝河，“阿坝”一名形成已有一千多年，唐太宗贞观年间，吐蕃雄起，松赞干布武力进攻松州向唐求婚，占领松州以西地区后，曾从吐蕃腹地阿里地区大量移民来此，经繁衍生息下来，这些藏人来后自称“阿里洼（瓦）”简称“阿洼（瓦）”，后来用作指命名这一地区的区域名，汉字译写成为“阿坝”，又如理县，本属清置理番厅，民国年间改为理番县，乃“治理夷番人”之意，后因藏、羌少数民族的极力反抗，始去“番”字改名理县。松潘县，唐置松州，元又置潘州（在今若尔盖包座），并置松、潘等处“军民安抚司”，明代将松、潘两州并为松潘卫，系合二州之名而成，清置松潘厅，民国改县，其县治地古称“岷山

镇”，如今称“进安镇”，这又是如何演变来的呢？那是在 1934 年，当地土豪李尔康惑众杀死伪县长汪一能，新任县长任和平上任后镇压了李尔康，提出“以安定求进步、以进步求发展”的口号，将岷山镇以穿城河上的古松桥为界，把汉回两民族聚居区划分为“进步”、“安定”的南北两镇，尔后由于社会制度，民族歧视，两镇间汉回民族发生纠纷，从未安定和进步过，解放后，由于消除了民族歧视和隔阂，才实现了民族平等，加强了民族团结，古松桥被称为“团结桥”，将两镇并合取名“进安镇”。汶川县所在地威州镇，古为“维州”一名的更名，乃意“威镇番邦”，据史载宋代由于藏羌民族起义反抗封建王朝的压迫和歧视，夺取城池，改维州叫“无忧城”意指平等自由，无忧无虑，平安度日。多么美好的愿望，正是反映出历史上民族间的残酷争战所带来的灾难，人们再也不想受折腾了。可是，时光不久，宋仁宗景佑年间“平息番害”，改维州为威州，意威治夷番。在马尔康与金川县一接界处，有一地名“格尔威”，嘉绒藏语方言意为“官定边界”，旧时这里充满边界纠纷。此处是群沟群梁一面坡之地，山上村寨森林茂密，草山宽阔，但耕地脊薄，粮食产量极低；山下村寨沃土良田，果木绿园，但无牲畜游牧之地，为此山上和山下由于生产生活的不便，常闹纠纷。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呢？那是在 1778 年，清庭一官员为划定各土司领地来到这里，这官员怕苦，未能爬上山顶，走至大面坡半山腰，就横跨斜线而走下河坝。随从划界的当事人和文记人员要求官爷表态确定具体界线时，官人鸦片瘾发作，呵欠连天，鼻涕眼泪交合，没趣地说：“我走一次，地管百代”。除此一言不发，就这样按他横山斜走的这条线划定了两地边界，这是违

背民意和客观实际的，造成两地人民生产、生活、往来间的不便。后来人们称其地为“官定边界”的“格尔威”。诸如这类地名对史料的起初记载，还有许许多多。

地名是对民族文化的记载

地名是一种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能体现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吸收、融合了多种文化成份，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生动的民族历史画面，地名把当时它产生的年代中的民族经济生活的特点，自然地理环境，劳动人民的美好精神寄托，追求、思想如实地告诉给了我们。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祖师宗喀巴为振兴佛教，派高足弟子查柯·阿旺扎巴到松潘征服异教——钵教（俗称黑教或黑经），建修了一座格鲁派寺院。钵教以驱咒作法，谣言把寺院咒垮和修建者咒死。教派斗争结果，佛胜钵败，寺庙不仅未垮，而且信众巨增，故该寺被信众命名为“毛尔盖”，藏语意为“越咒越兴旺发达”。

夏禹为中华民族建树了丰功伟绩，传说汶川县是禹王出生的故乡，留有许多歌颂他的地名，如禹碑岭、涂禹山、禹庙、禹穴，禹峰等汉语地名；同时还有藏语、羌语对它们的称呼，这些不同称呼，是谁译转了谁，现在还无法考证。汶川为藏、羌民族聚居区，涂禹山属草坡藏族乡住地，古为瓦寺土司所管辖，从前这里在羌民族中借古籍《吴越春秋》载“禹生于西羌，地名石纽”广传禹是羌族，传说禹娶涂山氏为妻，从而涂山被称为“涂禹山”，为此这里藏族说涂山氏为藏族，治水有藏族一份功劳。居住这里的汉族又按《华阳国